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
主 编 黄祖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成果

中国农村贫困 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
A Study of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in Rural China

王雨林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
主 编 黄祖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成果

中国农村贫困 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
A Study of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in Rural China

王雨林◎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 王雨林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10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

ISBN 978-7-308-06302-9

I. 中… II. 王… III. 农村—贫困—研究—中国 IV.
F3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9652 号

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

王雨林 著

丛书策划 陈丽霞
责任编辑 陈丽霞
文字编辑 夏晓冬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http://www.press.zju.edu.cn>)
电话: 0571—88925592, 88273066(传真)
排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90 千
版印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06302-9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总 序

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经济和居民收入仍保持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十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从 109655 亿元增长到 183085 亿元,增长了 6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6860 元增加到 10493 元,增加了 5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 2366 元增加到 3255 元,增加了 37.6%。此外,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十分明显,2005 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15.2% 下降到 12.6%,农村人口的比例从 2001 年的 62.3% 下降到 57%。然而,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凸显,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引起广泛关注,各种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时有出现。这些情况表明,我国正处在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互相交织、复杂多变的关键时期。

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在各种挑战中,“三农”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人地矛盾、粮食产不足需、农民权益亟待加强保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都反映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农业和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明显提高,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正日渐具备。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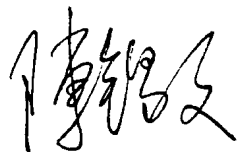
因此,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央针对“三农”问题,从 2004 年开始发了三个一号文件,2004 年的一号文件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题,抓住了“三农”问题的核心;2005 年的一号文件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抓住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关键;2006 年的一号文件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题,抓住

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这三个文件站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纲领。

在此背景下,我国理论工作者也加大了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力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ARD)主任、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院长黄祖辉教授带领 20 多位多年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对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和政策进行了联合攻关和深入研究,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以《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的形式公开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涉及了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方面,从基本的生产经营制度和组织体系,到具体的粮食、收入、社会保障等现实问题,从理论层面的深入研究到操作层面的政策设计,对近年来“三农”问题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与整合,提出了许多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新观点。这套丛书的内容深深植根于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丰富实践和探索,为全国其他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发行一定有助于把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事关全局,只有真正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才能把握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尽快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在经济上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让农民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充分调动 8 亿农民的积极性 and 创造性,才能真正加快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步伐,才能在 2020 年如期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2006 年 12 月 13 日

前 言

中国正处在一个沧海横流的时代,这是一个改革的时代,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正向现代化急速迈进的时代,一个正实践着几代人梦想的时代。当人们在新世纪之初满怀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呼唤和渴望之际,总会回忆起过去 100 多年来所走过的探索之路。

160 多年前,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华大地的古老国门,中华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面对坚船利炮,面对割地赔款,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应对以洋务运动,并兴建北洋水师。甲午一战带来的切肤之痛,方知弱不在船炮,而在制度。无论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对正式制度的变革,还是新文化运动对非正式制度的冲击,无不源于对落后挨打、开除“球籍”的恐惧和对国富民强、兴旺发达的渴求。其后,日本侵华战争改变了中国制度变迁的轨迹,短期内迅速动员一切社会力量抗日救亡成了最紧迫的任务,战时的制度安排成了抗战胜利后路径依赖的重要部分。1949 年后,国人迎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国内环境,却又走上了一条曲折坎坷的发展之路。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人们播下的是热情和希望,收获的却是贫穷和浩劫,换来的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最初从农村开始。一个看似小小的举措——把土地重新“分”给农户自己耕种,却开启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之门。此后,中国终于抓住了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发展机遇。基于“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的有利条件,持续 20 多年 GDP 年均 9% 以上的增长,年均 1 个百分点的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年均 1 个百分点的城市人口比例的增加。1980—2000 年,在吃、穿、用等消费品增长的推动下,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中的轻工业化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以住宅和汽车需求的全面启动为契机,中国工业化进入了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重工业化阶段。其间,中国又加入了令国人魂牵梦绕的 WTO,彻底结束了与国际社会疏离、隔绝的历史。总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速推进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

然而,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在中国试图用几十年的时间跨越发达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才走完的历程时,“三农”问题就像是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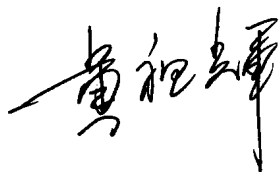
不和谐的音符,时时拨动着中国民众的心弦。从李昌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喊,到朱镕基坦言最牵挂的是“农民收入问题”,从《中国农民调查》披露的桩桩案件,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数据统计,所有这一切都凸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在当今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中央“一号文件”从2004年开始连续三年都把“三农”问题放在党和政府工作的首位,放到一个新的高度来看待。“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在党和政府日益重视“三农”问题的同时,国内理论界也加大了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力度,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激烈的讨论。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三农”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集合。这些问题不仅必然地服从于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也根本地受制于中国作为人地关系紧张、区域差异极大的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还现实地依赖于中国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变革、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更因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大在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后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凸显急迫性。

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不仅仅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面貌、稳定农业增长的问题,而且是如何谋求农业、农村、农民长远发展的问题,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与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充满矛盾、痛苦和冲突。因而,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的历史进程,是一场影响数亿农民乃至十几亿中国人生活的划时代的经济社会革命。

在此背景下,作为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路与对策》于2004年5月正式立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ARD)、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20多位多年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组成一个研究团队,进行了近3年时间的联合攻关,对“三农”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系统的探索,并将研究成果以《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文丛》的形式分批出版发行。

我们不仅期待着丛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对“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更期待着中国早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期待着经历了百年曲折的中华民族早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2006年12月31日于杭州华家池

目 录

1 导 论	1
1.1 研究的背景、意义	1
1.2 研究的方法、思路和内容	7
2 贫困研究理论	11
2.1 贫困定义理论	11
2.2 贫困线及测定方法	16
2.3 贫困程度的计算方法	22
2.4 贫困成因理论	27
2.5 反贫困理论	46
3 农村贫困情况	58
3.1 本书采用的计算方法	58
3.2 数据来源与调整	66
3.3 农村贫困情况	68
3.4 转型期农村贫困情况分析	72
4 农村贫困成因	97
4.1 从影响农民收入的角度看农村贫困成因	98
4.2 从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角度看农村贫困成因	110
4.3 从影响农民获益能力的角度看农村贫困成因	117

5 农村反贫困情况	132
5.1 扶贫开发机构设置	133
5.2 扶贫开发资金保障	135
5.3 扶贫开发分阶段情况	138
5.4 三大扶贫项目	143
5.5 其他扶贫项目	149
5.6 社会扶贫活动	157
5.7 对农村扶贫开发的评价	171
6 反贫困对策	181
6.1 总体性对策	181
6.2 地区反贫困重点	190
6.3 小结	199

1 导 论

1.1 研究的背景、意义

1.1.1 研究的背景

贫困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于贫困的成因以及反贫困对策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有人把贫困研究比喻为镶嵌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门学科上的宝石,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贫困学,贫困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正如 1000 个人心中有 1000 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心中对贫困都有各自的见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加紧发展经济、摆脱贫困,但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如果把中国的反贫困成就排除在外,全球贫困人口实际上是增加的。另一方面,各国和国际性研究机构对贫困的研究方兴未艾,许多学者也投身于研究贫困,有关贫困的理论成果令人目不暇接,中国也概莫能外。这种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情况不能不令研究者汗颜,也引来公众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对贫困的研究应该立足于实际,考查其内在的根源,而不仅仅是炫耀高深的理论和复杂的数据处理技巧。

对中国来说,从近代以来,人民就没有真正富裕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人民的生活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走上了富裕之路,但这条路走得并不平坦。1978—1984 年是农村反贫困成效显著的黄金时期,农村率先改革,制度创新激发了农民空前的生产热情,“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农业生产连创新高,农民收入得到显著增长,城乡差距也明显缩小,大量农村人口摆脱贫困。1986 年,我国开始实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扶贫攻坚,成效显著,尤其是著名的“八七扶贫攻坚”,基本解决了农村绝对贫

困问题。但我国的农村扶贫工作是以贫困县为单位的,非贫困县的农村贫困者难以享受到扶贫政策之利,加上我国的制度背景是典型的二元体制,国家长期实行以农补工的政策,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并向农民征收税费,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始终逊市民一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年徘徊,农民负担日益沉重,“三农”问题,即“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03年首次出现农村贫困人口不降反增的现象,引起人们对开发式扶贫方式的深入思考,农村反贫困工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期待新的突破。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民增收,同年免征农业税,对农村的政策由“以农补工”转为“多予、少取、放活”,2006年开始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由过去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为更加重视公平,政府日益关注“民生”。如针对免农业税后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乡镇负债又十分严重的情况,2005年5月8日,财政部印发了《2005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奖励和补助办法》(财预[2005]77号),出台了“三奖一补”政策。针对群众意见颇大的农村义务教育,先是在200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管理体制通知》,农村义务教育不再由农民筹资,接着在各地逐步推广“两免一补”,就是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进而国家决定2007年起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农村社会保障也有新举措,温家宝在2007年3月5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当年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的目标。由此可见,农村反贫困工作迎来新的希望,本书就是在此背景下写作的,希望能为农村反贫困研究作一点有益的贡献。

1.1.2 研究的意义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反贫困也是世界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公众对贫困的认识也逐渐发生改变。据调查,现在越来越少的人认为贫困为贫困者个人因素所致,更多的人则认为社会应对贫困者负责。在过去,我国许多人持“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观点,意识不到制度对于造成贫困的影响。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城市居民普遍认为不公平的城乡二元体制是农村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其次认同自然条件的影响;而农村居民则对自然因素

致贫的认同感较强,对于不公平的社会体制或有认识,不过更多地表现为谴责当地政府和乡镇干部,认为他们贪污腐败和工作失职,没有履行带领农民致富的职责,导致农村难以脱贫致富。无论如何,人们都体现出对公平和富裕的向往,认为必须摆脱贫困。所以,贫困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反贫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其意是讲,老百姓终日劳作不止,最大的希望就是过上小康的生活。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康社会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分三步走大有关联。

“三步走”目标第一步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是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是人民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关于小康社会的特征,邓小平描述为: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生活面积达到20平方米;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改变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邓小平所设计的小康社会,是一个吃穿不愁、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是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共同富裕为目标,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把小康社会界定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小康的社会属性方面,即“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其二是小康的实现水平方面,它“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1991年国家统计局等12个部门提出了小康水平的16项指标,其中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建设小康社会,就要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我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成效显著,可是经济发展水平远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停下发展的步

伐。投资、外贸和消费被称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我国现在的外贸依存度已达 80%，被称为“世界工厂”。可是应该看到，我国的外贸型企业多从事简单加工，并没有掌握关键技术，仅仅是凭低廉的优势去赚取加工劳动力价值而已，绝大部分利润是被国外企业拿走的。加入 WTO 以后，我国企业面对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经常遇到反倾销诉讼、技术贸易壁垒，并将逐渐受到伦理壁垒的限制，因此外贸这驾马车具有不确定性。至于投资，我国已实行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等特大工程，可是就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似乎并不怎么显著。我国制定大型投资决策不够透明，也不够科学规范，这严重影响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这三驾马车中，我们尤其要注意消费的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来促进消费增长，可是居民却把钱袋越捂越紧。尽管银行利率处于 7 年来的最低点，又加征利息税，仍然抑制不了老百姓把钱存入银行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靠给公务员加薪来拉动消费不过是杯水车薪。教育、医疗和住房成为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使人们预期消费增加，不得不紧缩现期消费。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反贫困可以使人们减少对未来生活不稳定性的预期，对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从而增加现期消费。而对于贫困人口来说，脱贫解困后也必然伴随着消费的增长。我国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如果没有农村的繁荣，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就没有后劲。反贫困，尤其是农村反贫困就显得十分重要。只有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才能有效繁荣农村市场，促进投资和消费，从而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由此可见，农村和农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反贫困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2. 反贫困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建设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深化与发展。我国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到 2020 年，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

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谐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我国农村仍有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这是社会不和谐的因素。我国改革开放前,尽管存在地区差别,但人口流动性不强,在同一区域内人们的生活水平相似,对贫困的感受不深。随着改革的深入,贫困差距、城乡差别日益加大,一部分人产生“仇富”心理,对社会不公充满抱怨。如果这种情绪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极易引发犯罪行为。有学者通过对犯罪行为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抢劫、盗窃的发生,与行为人的相对剥夺感和自我贫困认知有关。如今我国虽然还维持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但农村与城镇的交流十分频繁,农村人口的相对被剥夺感已大大增强,能感受到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据统计,农民在城镇的犯罪率逐年上升,我们在谴责犯罪的同时,不能不去深入考察其深层次的原因。笔者曾在网上看过一篇记者采访深圳“砍手党”成员阿星的文章,他本是一名老实本分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从农村来到城市,在打工挣钱的梦想破灭以后,他和同乡在光天化日之下,砍手夺包,犯下了抢劫的罪行。如果不是因为贫困,也许阿星走不到这一步。古人有云:“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们只有丰衣足食,社会才能维持安宁,否则“穷山恶水出刁民”,贫困者为了生存会不惜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要想社会安定团结,就不能不与贫困作斗争,否则贫困会借助暴力向社会“昭示”自己的存在。

由此可见,尽管按照社会学的贫困功能理论的说法,贫困的存在可以让社会成员感到危机,从而勤奋工作,贫困的存在是有意义的。可是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构成复杂,多数生活在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再考虑到我国特有的“重城抑乡”的二元结构,农村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我国农村贫困主要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因此不适用贫困功能理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积极反贫困。

3. 反贫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2005 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十一五”期间,要全面落实科学发

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推进农村工作,努力实现农业稳定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总体上经济发展已进入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深入人心的新形势下,中央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具体化。在中央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包括: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等部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确立统筹城乡的发展思想。当前必须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党的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更快发展的投入机制,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逐步成为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要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机制,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建立健全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要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工作机制,保证新农村建设始终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断创新农村体制;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坚持科学规划,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步骤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推进;坚持发挥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使建设新农村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目标。

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提升农村发展水平,解决农民实际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历史新机遇。反贫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

1.2 研究的方法、思路和内容

1.2.1 研究的方法

本书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运用数学和经济计量学模型,在丰富翔实的统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全面认识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从中总结出反贫困对策。

1.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笔者分析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主要运用 Excel、SPSS 和 SHAZAM 等软件进行计算。首先用 Excel 软件将统计年鉴上的分组收入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出洛伦兹点,再用 SHAZAM 软件拟合出洛伦兹曲线,进而计算出 FGT 贫困指标,包括贫困发生率、贫困距指数和平方贫困距指数等,还将这三项指标的变化分解为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以 FGT 贫困指标为基础,笔者还计算出贫困人口、贫困者收入缺口、收入总缺口占财政收入比率等可以反映农村贫困情况的指标。笔者在分析贫困成因和反贫困对策时借鉴了定量分析的成果,如探讨各地区反贫困对策时,拟合出贫困率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相关关系,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反贫困重点。

2. 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贫困是一个研究领域,本书在研究理论中选择了贫困定义理论、贫困线及测定方法、贫困程度的计算方法、贫困成因理论和反贫困理论这五方面进行分析,与接下来的实证分析相辅相成。如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情况利用了贫困线及测定方法和贫困程度的计算方法,对农村贫困成因的分析借鉴了贫困成因理论,对反贫困举措的分析借鉴了反贫困理论。

3. 对比与抽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书数据很多,大量采用了对比分析方法,既有转型期各阶段的纵向对比,又有各经济区之间的横向对比,通过对比对我国转型期农村贫困有了全面的认识。通过对比,结合贫困的理论分析,根据数据抽象出理论观点,分析了农村贫困成因,进而对我国转型期农村反贫困问题提出了对策措施和建议。

1.2.2 研究的思路

本书的研究思路就是通过对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情况的分析,反思农

村贫困成因,进而探索反贫困对策。要分析贫困问题就要首先确定什么是贫困,如何确定贫困标准并计算贫困情况,还要对学术界如何看待贫困成因和有哪些主要的反贫困理论有所认识,这些都是本书第二章贫困研究理论所要关心的问题。接下来便是实证分析:一、深入了解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情况,不仅计算出各年度我国各省市的农村 FGT 贫困指数,还将 FGT 指数的变动分解为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时详细分析了转型期不同阶段的全国农村贫困情况,将各省市农村贫困情况按经济分区加以比较研究;二、在分析农村贫困成因时,借鉴了贫困情况的研究成果,从收入、分配和能力三个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对贫困成因有了全方位的了解;三、在总结农村反贫困对策时,针对我国地区差异大,各地自然条件不同等特点,除了分析总体性对策,还探讨了各地区反贫困重点,使对策更具有针对性。具体的研究思路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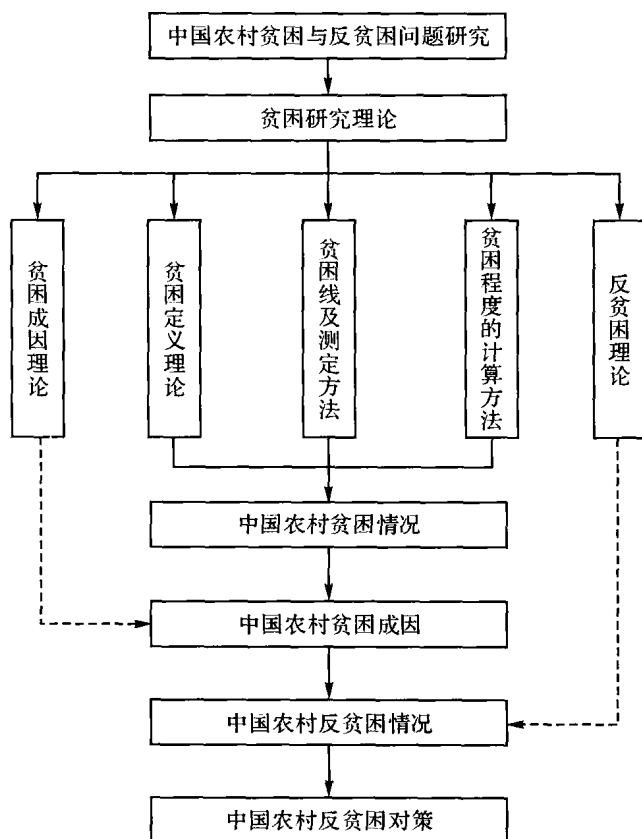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基本思路图